

南共联盟綱領和 思想斗争“尖銳化”

〔南〕維利科·弗拉霍維奇著

(內 部 发 行)

226(59)
5551

南共联盟綱領和 思想斗爭“尖銳化”

〔南〕維利科·弗拉霍維奇著

林南庆譯

Veljko Vlahović
PROGRAM SAVEZA KOMUNISTA
JUGOSLAVIJE I "ZAOŠTRAVANJE"
IDEOLOŠKE BORBE

Kultura, Beograd

1959

根据南斯拉夫“文化出版社”1959年版译出

南共联盟纲领和思想斗争“尖锐化”

〔南〕维利科·弗拉霍维奇著

林南庆译

*

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 $\frac{3}{4}$ · 字数 42,000

1964年2月第1版

1964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2002·188 定价(七) 0.26 元

印数 00,001—2,950

出版者說明

本书作者弗拉霍維奇 1935 年参加南共，曾任《战斗报》社长，南共中央鼓动宣傳局局长等职，1958 年 4 月当选为南共联盟中央执行委員，6 月任南共联盟外交委員會主席，南共联盟中央組織政治書記处書記，1960 年 4 月当选为南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执委会書記处書記。

他的这本书是列为《政治丛书》之一出版的。他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为南共联盟修正主义“綱領”辯护，強調“綱領”的全部内容所谓“反对教条主义”，“也就是說，首先是严肃地批判斯大林观点”。

书中首先否定社会主义陣营和帝国主义陣营的根本对立，认为資本主义“正在退出世界舞台”，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只能采取“加强国际合作”的方針。其次否定加强无产阶级專政的国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从一开始就要求在自己的組織中“包含着消亡的开端”，并妄断通过国家的不断加强来达到国家消亡的途徑是“錯誤”的，理由是什么“不断加强的东西是很难消亡的”。接着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專政的学說，认为資本主义“为了挽救自己而斗争时，也被迫作出了一系列的让步”，而“大部分让步”却是“挖了資本主义的墙角”，“加强了資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社会主义的萌芽”，还說，資本主义制度内部已发生了“某种过程”，使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推进”。书中进而誣蔑社会主义国家的全民所有制是“国家資本主义”；还利用所謂“反对个人迷信”誣蔑社会主义制度，认为要是說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跟“社会主义制度毫无关系”，那就是“有意迴避”“真正的根源和性质”；并特別反对加强党的領導，认为这样做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到使党脱离群众，使党极

度官僚化”。更进而攻击中国，說“在这样一个极为落后”的国家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設，是所謂“通过反映落后性的形式”，而把这种“形式宣布为当代馬克思主义理論和实践的最高峰”是“可悲的”。还說共产党员增加到“三千三百万”，这是个“龐大”的数字，但是大多数党员集中在“落后”的国家，这就使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降低”了。最后則一面贊揚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已認識到过去的錯誤”，一面坚决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共同規律，宣称决不“放弃”走向社会主义的“各种独立自主”的道路。

从本书可以了解鉄托集团怎样用詭辯手法，玩弄馬克思主义詞句，为自己的背叛作无耻的辯解，并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陣营和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現在把它翻譯出版，供內部參考。

目 录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	15
关于现代资本主义	23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各种矛盾	29
党的领导作用	34
思想斗争“尖锐化”和社会主义各国間 正确关系的问题	38
关于“尖锐化”的某些现象和某些后果	46

反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运动是有其相互联系的几个方面和几个任务的。

这个运动的任务之一，就是使思想斗争“尖锐化”。目前的“尖锐化”就是要：巩固在教条主义强大时所形成的思想立场；在新的条件下更进一步地研究教条主义的观点；清算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中的反教条主义的思潮；从思想上理论上破坏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的声誉，破坏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反映现代社会主义发展中特定过程的观点的声誉。

思想斗争“尖锐化”是在“坚决地和无情地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的口号下开展的，但实际上这样的“思想斗争”并没有损害真正修正主义的半根毫毛。

思想斗争“尖锐化”实际上几乎没有间断地进行了十年之久，但总的来说，最终结果将是：教条主义逐渐地被驳倒，真正的修正主义不断地出现，工人运动暂时更为迷失方向以及在工人运动中日益意识到当前斗争阶段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任务和问题的那些力量不断地得到加强。

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是思想斗争“尖锐化”的中心，虽然这场斗争因为有許多力量参加进去而是在一个极为广泛的战线上进行的，但这些力量迄今还没有完全公开地表现出来。

南斯拉夫所以成为这场斗争的中心，是有許多原因的，特别是因为在建设着社会主义的各国和掌握了政权的各国共产党之间的互相关系得到短暂而蓬勃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坚决地反抗了消极的现象和不正确的作法。

南斯拉夫之所以成为思想斗争“尖锐化”的中心，还因为我们

的实践就是对社会主义官僚主义变形的否定，而且这种实践本身的存在就是对教条主义不断地批判和否定。

反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运动从1948年以来就一直沒有間断过。这个运动首先反映了社会主义发展和建設中某些社会物质的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上是現代社会主义发展中一系列矛盾在思想上的反映。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一个时期，即人們称之为“恢复列宁主义的时期”，虽然为时不长，已沉重地打击了教条主义的政治思想基础和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修正主义者。然而，教条主义的理論和实践所由产生的社会物质基础却不允許这种猛烈的打击，不允許“恢复列宁主义”。

“恢复列宁主义”这个字眼有一个时期曾經被大力地強調过，而現在却几乎被人忘掉了，这本身就反映出一些問題。就是說，对教条主义的譴責实际上有时是羞答答的，有时又是无意識的。这是由于在斯大林一系列的理論发生动摇而站不住脚时，才需要用这个口号作为暫时的支柱。但是，科学地分析一下这个口号，就可以看出它是不合邏輯的。在新的条件下不是也不可能是簡單的“恢复列宁主义”。恢复列宁主义就是說只有通过运用列宁对于馬克思主义的科学論述和列宁死后全部丰富的事件，才能在研究和說明現代事件中恢复馬克思主义的方法。但是，事变証明，那些已經这样作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能够毫无困难地实现这一任务。因此，他們在今天就暂时退却了，而教条主义的力量便极力重新調整和巩固自己的队伍。于是“恢复列宁主义”这个口号，对于教条主义的力量來說，显然是不再适合了，而更适合它們的却是思想斗争“尖锐化”，首先是再一次努力来破坏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声誉。

今天，我們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修正主义是被削弱了，但它們一再企图克服自己的不穩，巩固已动摇了的政治思想基础并力求繼續得到发展。

不仅在苏联，而且在苏联以外的落后地区都存在着一一些重新形成教条主义的物质政治条件。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影响着官僚主义及其思想論据所由产生的物质政治条件。一种条件消失了，另一种条件又产生了。但是，在今天的条件下形成的教条主义却低于斯大林时代的政治思想水平。今天反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思想水平也証明了这一点。

斯大林是在他的观点和某些作法取得成果的时候，特别是在为消除从沙皇俄国继承下来的严重落后性而斗争方面取得成果的时候，才把他的这些观点和作法提出来并付诸实施的。由于要求迅速消除这种落后性，就产生了人們称之为“个人迷信”时代的許多現象。显然，今天，在苏联（它不仅消除了落后性，而且在很短的历史时期中成为經濟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管理方法也如不久以前的許多理論观点和作法一样，不仅不再适合于需要，而且成为社会經濟进一步加速发展的障碍。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是：在消除苏联内部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同时促进了争取整个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发展。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一个短时期发生的一些事件是非常生动的、富有内容的。这个时期首先提出了社会主义力量应当加以解决的一些最重大的問題。因此，现在就有这样一个主要問題：这些問題是否能得到适当的解决？反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运动以及其他一些現象实际上是不是严重地違反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某些重要的观点？

为了答复这个問題，必須对所有的問題进行广泛的研究。既然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主要是在苏联条件下不可避免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那么，社会主义战后的发展也就是这样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既具有“个人迷信”时期的积极表现，也具有它的消极表现，也具有对現代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要求。在一定时期，反对旧时消极遗产和当前一些消极作法的斗争，表现得很突出，而在另

一个时期，社会主义发展中矛盾的另一方面，即这一发展的消极方面和消极作法，则表现得更为强烈。显然，今天我们是处在这个过程的后一方面表现得更为强烈的时代。

因此，今天反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运动，又使业已表现出动摇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再度复活，又使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再度采取宗派主义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因为对外政策总是和对内政策相联系的。这种对理论的教条主义态度，以及在对内对外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现象，虽然是暂时的，但必然要使教条主义进一步得到加强。这种政策的后果常常影响到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各国中的党群关系、以及为形形色色消极的反动势力提供适宜的土壤。总之，从这种宗派主义的立场出发，就无法进行影响群众的斗争。在人们的内心中造成畏缩，不信任和缄默。于是党削弱了，为资产阶级理论的活动和为真正的修正主义的加强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不久以前在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事件，以及在教条主义经过长时期发展和表面上思想团结一致（它的具体表现就是情报局的决议）以后，日益暴露出来的西欧某些共产党中存在的不同派别，就最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情况本身就包含许多危险，它妨碍人们去观察实际的问题并寻找正确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今天的情况同样也包藏着各种令人不愉快的事。但不管怎样，最好还是不要让消极的现象积累下来并由于它们的积累而威胁着社会主义的基础，不要以为在这些消极现象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障碍时，就会出现消灭这种障碍的社会力量，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要为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扫清道路是要求和需要花费更多的力量的。

因此，表面上围绕着南共联盟纲领所进行的争论，实际上也就是反映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物质运动，反映了那些在建设着社会主义各国的落后社会物质基础上已经成长起来的或正在成长中的力量要求为这个运动进一步扫清道路上的障碍进行斗争。

社会主义（它正在加强）和资本主义（它正在退出世界舞台）之间的矛盾，对社会主义发展中存在着的矛盾还是发生作用的。和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所采取的政策相比，现在共产党同群众的联系更少了。这种情况，对于现代资本主义来说当然是更为适合的。如果把1948年到1954年同1954年到1958年这两个时期国际关系和工人运动的状况简单对比一下，那将最好不过地证实这一论断。这两个时期，无论就其进行斗争的前途来说，或者就其对于资本主义各国中的劳动人民的影响来说，或者就社会主义各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以外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力量的相互联系来说，或者就其同反殖民主义和人民解放运动等的联系来说，都是不同的。教条主义者害怕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批评将不利于工人运动，那是毫无根据的。结果却是相反，在工人运动中出现了新的高潮。甚至发生了像匈牙利事件那样一些重大事件也阻止不住这一高潮，尽管这些事件，一方面在帝国主义集团里引起这种野心，即梦想“阻止”社会主义进程的发展，甚至梦想使那些已经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国家“非社会主义化”；另一方面引起革命运动内部教条主义者的恐惧，他们加大压力使运动恢复到旧的立场、旧的方法、旧的关系和教条主义的思想观点上去。

资本主义力量已经有40年节节败退了，而且它们也无法阻止这个进程。它们手忙脚乱地为自己的地盘受到各种新的威胁而应战，从而它们之中有一部分人竟想发动战争，不仅准备把战争作为中止退却的最终手段，而且在不同的程度上阴谋把战争作为恢复某些或所有已经失去的地盘的最终手段。帝国主义特有的这种现象和社会主义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也使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产生这样的一种思潮，以为单纯依靠阵营的军事经济组织的力量就能“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

把战争看作是解决国际问题的手段，这是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只有和平共处政策才是和社会主义相符合的，因为如果能够保证有一个较长的和平时期，那么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保证社会主义继续不断地得到加强。

随着殖民主义崩溃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进程的发展，社

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取得辉煌的成就，这样就为社会主义国家更加加强自己对世界经济、政治领域的影响开辟了前景，因为社会主义在这些领域以前是薄弱的，从而也就无法在影响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方面同资本主义的力量展开竞赛。看来，有许多工人阶级政党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前景，所以，手足无措地死抱着以前的斗争方法，并且在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活动中，无论在内部发展方面或者在制定对外政策方面，经常摇摆不定。

在国外政治局势尖锐化的时期，整个国际政策的摇摆不定，一些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暂时的摇摆不定，这些就是反对所谓“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斗争的重要因素，因为我们的态度是：社会主义各国的对外政策只能采取始终不渝地为和平而斗争并加强国际合作的方针，这样就会消除摇摆不定，以及消除那种以为“实力地位”政策甚至也可以表现在社会主义各国的对外政策中的想法。

但是，这个问题是值得更详细来研究的。在本书中，我只想谈有关“批评”南共联盟纲领的思想斗争及其尖锐化的另外一些问题。

第一个要说明的问题就是制定南共联盟纲领时所运用的方法和我们的批评者对这一纲领的“批评”并使思想斗争“尖锐化”中所运用的方法。

一眼便可以看出，制定南共联盟纲领所运用的方法和纲领批评者所运用的方法，这两者是完全对立的。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或者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门科学，以及后来极其丰富的发展进程，就是制定南共联盟纲领的基础和来源。我们从这个基础和来源出发，认真地论述了当前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某些问题。在论述我们自己的任务时，所依据的是共产党即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40年期间，在为取得政权而进行斗争中、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旧南斯拉夫的民族不平等中、在革命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积累

的經驗。這些經驗是同國際工人運動的經驗，特別是共產主義部分的工人運動的經驗是相互聯繫和相互滲透的，因為南斯拉夫共產黨在共產國際解散以前曾經是它的成員，而在情報局通過眾所周知的決議以前是由一些共產黨組成的情報局的成員。戰後的經驗在質上是新的，其中也應該包括 1948 年後有關社會主義各國關係問題方面所取得的經驗。這個問題實質上是由於形成一系列新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在實踐中被提到議事日程上的一個新問題。

在戰後時期，我國工人運動同其他國家工人運動合作方面所取得的某些經驗，對於制定新的南共聯盟綱領同樣也是有用的。

我們之所以要在制定南共聯盟綱領時說明把有關一般社會運動中、特別是社會主義發展中某些現代現象的爭論（儘管這個爭論是不大的）看作義不容辭的義務，尤其是因為以前各國共產黨的綱領以及我國的綱領顯然並沒有把社會發展一系列新的事變概括進去。

近幾十年來，共產主義運動中絕大部分人漸漸地放棄了用馬克思主義方法來論述某些迫切的問題，這首先是因為斯大林長期以來所起作用的結果。

幾十年來，斯大林對現代一切過程專橫地和不容人爭論地作了評價。他的著作中的確有不少正確的評價，但是，對許多極為重要的問題的評價，卻不是以馬克思主義方法進行實際分析為基礎的，是簡單化的、自相矛盾的和不科學的，或者說，有一部分評價是需要重新研究和分析、重新加以估價的。

且讓我們舉幾個例子來說明：

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提出形成了“兩個平行的也是互相對立的世界市場”（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7 頁）的論點。他在論述這個論點時得出結論說：“可以滿懷信心地說，在這樣高的工業發展速度之下，很快（著重點是著者加的。——譯注）就會使得這些國家不僅不需要從資本主義國家輸入商品，而且它們自己還會感到必須把自己

生产的多余商品輸往他国”(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頁）。不需要作什么深入的分析，便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多么奇怪的邏輯：不从这些国家中輸入商品，怎么能够把商品輸往他国，莫非斯大林认为以无偿的援助的形式“輸出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

“很快”一詞是可能有不同的解釋的。但是，在斯大林提出这些論点后的五年中，实践却在本质上駁倒了他的观点，因为社会主义各国坚决主张扩大陣营外的商品交換和其他形式的經濟合作，而且近五年来，这种交換又增加了并有进一步增长的趋势。这是值得認真来进行分析的复杂問題，因为从斯大林的这样的一些观点中所产生的某些实践，某些政策，过去和現在都导致了社会主义各国在陣营內部閉关自守，無論在經濟上或者在政治上都是如此，另一方面，这种情况导致各国內部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困难增加了，导致放弃对于非社会主义之外地区的积极作用等等。

或者，再举另一个例子來說：

斯大林在同一本书中斷言，“在現代的条件下，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提出的論点，即关于資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市場相对稳定的論点不再有效”。斯大林同时还斷言，“列宁在一九一六年春天所发表的論点，即資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說来，資本主义却較以前发展得更迅速无比’的論点已經失效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頁，引文与原著有出入。——譯注)。

光說这一个或那一个論点有效或无效，那是不够的。必須認真地全面地分析現代世界市場和現代資本主义的发展，这个发展的趋势，在这一发展中全部的变化，从而在这个基础上得出一定的結論。

显然，有必要圍繞着斯大林把爭論引导到正常的道路上去。問題不仅仅在于專断、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斯大林对人的不信任。問題在于要分析他在理論上和在实践中究竟怎样違背馬克思主义

关于国家的原理。特別在夺取了政权以后他的关于党的理論，以及其他許多的問題上的理論是怎么样的。这里，本质的問題不在于是否承认斯大林在苏联实行工业化并使苏联变为强大的工业国方面的功績，或者是否承认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法西斯方面的功績有多大。如果不科学地进行历史的分析，那就会犯不客觀的毛病。今天最重要的問題是使馬克思主义的思想得到解放，使它有可能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并得出相应的結論。进一步的发展当然要求有大量的个人和所有的党敢于去研究現代的事件。在这一研究中是会产生錯誤、偏差和不科学的观点的。这样，通过建設性的爭論冲突，通过科学的研究問題，就会在許多国家中涌现出大量优秀的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家和政治家，从而将防止通过不科学的和非社会主义的方法进行爭取壟断地位的斗争。不过，当只有一个革命取得胜利，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时，其他国家的革命政党便把这个革命、这个国家及其領袖的主张当作客觀真理的表现来接受，那也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样作甚至是絕對必需的。然而，最近，革命的斗争已經取得了新的胜利，产生了一批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实践也更加丰富了，从而社会主义的思想也应当和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运动的整个战綫結合在一起，而不仅仅是和某一部分、某一地区結合在一起，不管这个部分、这个地区的經驗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重要和多么的丰富。

南共联盟綱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制定的。制定新的綱領的決議，早在南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就提出来了。这个決議的提出是毫不奇怪的，因为长期以来在工人运动中就已經感到有必要把現代的問題和今天的任务补充到綱領中去。无怪乎，早在20年前，苏共就通过了制定新的苏共綱領的決議。但是，这项工作已經过了20年还没有进行，不是等待了几年，而是等待了几十年了，这些年来，已經連續不断地提出了新的問題和新的任务，要求人們答复这些問題和解决这些任务。如果对这些問題和任务默不作声，那

就会一无所得。默不作声本身就是一种僵化的表现。

也許有人会指責我們的綱領对于某些重大問題的論述太謹慎，只是把它們提出和作了补充而已。

許多非常重要而且具有广泛意义的問題，在綱領中只是提出或作了部分的論述而已。这些問題实际上是由于社会主义本身的发展而提到議事日程上来的最重大的問題。国际工人运动必須严肃地注意这些問題，而不問那一个政党在今天对它們究竟采取怎样的态度。为了充分地論述这些問題，就需要为数更多的党作出努力，而首先就需要为取得能够认真地研究这些問題的一种良好的气氛而斗争，因为十分明确，今天的气氛束縛了現有的力量和对已經成熟了的許多問題作出更正确的說明、作出科学解释的可能性。

我們可以簡要地概括如下：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是概括了本身的經驗，同时从整个工人运动中吸收了某些教訓，特別着重地詳細研究了現代世界的社会經濟过程以及力求从这些社会經濟过程中得出一定的結論。

綱領的全部內容是既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現代修正主义，也就是說，首先严肃地批判斯大林在思想上形成的某些观点和看法，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看来，这些观点和看法是經不起科学的馬克思主义批判的。

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許多原理向我們指出了在研究所提出的問題時必須加以运用的方法，在制定綱領時也是应当加以注意的。

这就是这样的一些原理：

恩格斯在 1885 年致維·伊·查苏利奇的信中写道：“在我看来，馬克思的历史理論是每一个始終一貫和前后一致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所必需的只是这一理論应用到本国的經濟和政治条件中去”（《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427 頁）。

恩格斯在致紐約弗·凱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写道：“我們的理論是發展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並且機械地加以重複的教條。愈是不從外面把這種理論硬灌輸給美國人，愈是通過他們的親身的經驗（在德國人的幫助下）去檢驗之，它就愈會深入到他們的心坎里去”（《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43頁）。

列寧寫道：“現在必須弄清一個不容置辯的真理，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必須考慮生動的實際生活，必須考慮現實的確切事實，而不應當抱住昨天的理論不放，因為這種理論和任何理論一樣，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體上概括實際生活中的複雜情況”（《列寧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頁）。

列寧在指出這個事實時，還通過對他當時一些迫切問題的論述作了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示范、他不是簡單地重複某些馬克思、恩格斯的原理和觀點，而是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科學發現來掌握馬克思、恩格斯的方法，以及運用它來說明在他領導下組織1905年革命、十月革命以及在資本主義制度中打開第一個缺口時所發生的事件。這樣一來，就向一切的革命力量，而首先是向馬克思主義的政黨提出了必須善于把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則運用到這一個或那一個國家的特定具體情況中去的問題。不過，列寧在第三國際成立時才提出這個要求。他經常提醒人們不要抄襲俄國、蘇聯的經驗，而要善于把一般的原理、一般的原則運用到不同國家的特定具體情況中去。

我們的黨在戰爭的前夜和在戰爭的時期也是從這樣一個原理出發的：在我們的具體的條件下，南共黨員必須善于把爭取社會主義革命和這一革命勝利的基本原則運用到特定的條件、我國具體的條件中去。創造地解決已經提到議事日程上的那些問題，才能使我們的黨發展成為一支強大的力量，並領導革命到最後勝利。從這些原理出發、估計到所取得的經驗並分析死板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和主張務必照搬蘇聯的實踐所導致的後果——這一切也是制